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55-07

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思

樊瑞科, 刘苗苗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数据为基、算法驱动、虚实交融、人机互构”的数智时代方兴未艾,推动信息社会迈向新阶段。数智时代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境遇,意识形态工作数智化成为大势所趋。如何顺应这一趋势进而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便成为一项值得关注的新课题。当下,推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亟须明晰三个基本问题。从概念认知来看,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独特的内涵。从特征分析来看,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内容数据化、过程智能化、载体平台化与方式视觉化的特征。从价值意蕴来看,数智技术有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与吸引力。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审视成为深化和拓展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逻辑前提;建设实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08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以技术为动能的数智时代逐渐拉开帷幕,正在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并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的新变量。意识形态这一“老问题”面临诸多“新情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数智化转型成为时代必然。当前,学界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而言,学界普遍采用“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该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因此,深入厘清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鲜明特征与价值意蕴等学理问题便成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

明晰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范

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1] 深入解读“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便成为推进该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数智技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联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 数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及广泛赋能正在开启信息社会的数智化转型,助推人类社会迈入数智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将数智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期抢占未来竞争

收稿日期:2024-04-1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论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特征及价值”(202307064);河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智技术赋能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HB23MK003);2024年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KCJSX2024066)。

作者简介:樊瑞科(198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本文信息:樊瑞科,刘苗苗.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思[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55-61.

新高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美国在2016年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此后分别于2019年和2023年发布更新版本,试图继续强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目标是确保欧盟成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全球领导者。此外,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也发布了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面对数智化的时代潮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相继将引领和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塑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历史和实践证明,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引起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例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互构互嵌、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把(自然)科学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但是,他们丝毫不否认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3]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赋能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不断驱动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导致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联动反应。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赋能作用表现为:科技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的制度变革(例如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助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最强大的杠杆”^[4])、丰富其时代内容(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揭批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的同时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和强化其现实功能(例如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5]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能动作用,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更为突出。例如,科技的发展不单由冰冷的技术逻辑和理性思维所决定,也受道德伦理和感性思维所影响,尤其是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对科技的发展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其不仅关涉一个国家科技事业的价值定位,也直接影响科技人员伦理规范和意志品质的培育践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科学家精神便是我国在新时代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6]

在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不断嵌入并形塑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等

诸多领域,也构成了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的重要变量。一方面,数智技术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机遇。这体现在:数智技术赋能我国意识形态宣教理念由单向灌输向以人为本转变、意识形态宣教模式由群体化规模教育向个性化私人定制倾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从科层制传统向现代性治理转移、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由显性教育向精确化微传播的隐形渗透转型、意识形态危机处理由事后被动应对向事前主动预测过渡等,进而有助于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新挑战。这表现为:数智至上思潮弱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属性,数智孤岛问题离散其整合功能,数智伦理失范遮蔽其道义形象,数智资本逻辑消解其人文精神,西方数智霸权加剧其安全风险以及数智人技短板制约其建设动能等,从而威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从数智技术本身而言,我国数智技术战略顺利实施和数智技术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规制,其进一步印证了二者互动互构的辩证关联。

(二)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殊规定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基于概念。对概念的科学界定是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逻辑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指某一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原始状态,内在地包含了其全部观点,构成了该理论体系演化发展的基础。深入推进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亟须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坚持以“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基本认知为原则,以推动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发展为目的,尝试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作如下界定:它特指在“当代中国”的时空境遇下,党和国家顺应数智时代的发展潮流与恪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守正创新的必然要求,主动将数智技术有机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的实践过程。

准确把握“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殊规定,需要将其置于“当代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境遇进行深刻透视。首先,坚持党的领导

彰显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独特政治优势。我国数智技术的健康发展、广泛赋能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在数智时代,无论借助数智技术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改革创新,还是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数智技术“技术向善”的价值导向,均需要积极发挥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其次,“人民至上”的发展原则体现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价值立场。在西方世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致使数智技术成为资本家追求资本增殖和强化剥削的数字杀伤性武器,资本与政治的勾连也加剧了“数智暴政”风险。在当代中国,“坚定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7]。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我国发展数智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体现了数智技术的民本理念。最后,数智技术发展成效奠定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现实基础。就当代中国而言,数智技术的应有优势、数智产业的有力支撑、数智技术的法规保障、数智文化的逐渐兴起等为数智技术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利因素,成为深刻理解“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一特定内涵的重要向度。

二、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特征

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并非数智技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简单组合或生硬拼接,而是二者相辅相成、互动交融的耦合过程,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内容生成的数据化

在数智时代,海量异质数据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表征和新工具。舍恩伯格和库克耶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回顾了人类计算和记录的发展历程,认为“量化一切”构成了数智时代的核心命题。他们认为在数智时代不仅要关注信息技术的变革,更应关注对数据本身的分析应用。数智时代,数据爆炸性增长已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乃至本质属性,势必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在对数智技术的理性认知上,尽管国内外各届人士见仁见智,但对数据规

模之大的理解却成为普遍共识。从诸如麦肯锡、IDC以及Gartner等全球著名IT咨询公司到舍恩伯格、李国杰、梅宏、涂子沛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一致认为大数据成为驱动信息社会数智化转型的“始基”。

在数智时代,海量数据为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据资源,为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待发掘的“金矿”。质言之,在强调“数据驱动”的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既要建设视角置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世界,还应关注更为宽旷的虚拟数字空间。在数智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博弈的主要场域,成为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变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络主导权。”^[8]当前,我们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的繁荣兴盛、社会民主的改善等都离不开对数据的挖掘采集、储存整理以分析应用,其也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内容生成的重要资源。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惟有“与数偕行”才能不断彰显其时代气息和丰富其时代内容。

(二)运行机制的智能化

在数智时代,海量数据只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生产要素,要想真正发挥数据的效能,还需借助强大算力和智能算法来实现。一方面,内容生产的智能化。传统意义上,职业化的意识形态阶层是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分工视角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家”,认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9]。伴随信息生成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以Chat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生成式AI快速发展,“人机协同”或将成为未来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发展趋势。例如当前以媒体信息生产为例,数智技术新闻、机器人写作等已然成为媒体信息发布的重要形式。今日头条“张小明”、封面新闻“小封”、新华社“快笔小新”等写作机器人在提升信息生产效率和推动新闻生产流程重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家”的传统认知。

另一方面,内容发布的智能化。伴随数智时代的来临,算法已深度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人类已悄然进入“算法社会”。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信息内容推送、操控舆论导向乃至左右价值选择的技术手段,成为形塑思想观念的技术权力,彰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伴随以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传播业态的蓬勃发展,以今日头条、快手、抖音等聚合类平台的快速崛起,“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能化算法推荐成为数智时代信息生成与分发的主导方式。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来看,主流媒体充分利用智能推荐算法,在对多元异质的媒介信息进行感知采集、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有效把握和科学预测不同社会群体乃至每个成员的个性化理论需求,精准推送符合特定群众和个人需求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与传统媒体线性传播模式相比,“在算法推荐技术加持下的内容会根据用户反馈做到及时调整,让信息更‘懂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更加智能化”^[10]。数智时代信息生成与分发的智能化趋势不断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时代转型。

(三)建设载体的平台化

在数智时代,伴随移动网络的普及和智能媒体的应用,信息生成与传播的平台化趋势更为明显,平台型媒体不断崛起。平台型媒体是开放平台与专业媒体的结合物,具有多元主体交互、多样载体联动和多重媒体集成的鲜明特征,正在重塑我国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为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机遇。当下,国外的推特、谷歌、脸书、照片墙,国内的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百家号等皆为平台媒体的典型代表。“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播格局,也为意识形态开辟了新的统治空间,让其触角超越国家政府和政党深入到每个移动互联网使用者、深入到整个社会”^[11],为革新与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手段载体。

快速崛起的平台型媒体为拓展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空间。例如短视频平台凭借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等显著特征逐渐成为吸引流量的重要端口。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67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53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96.4%^[12]。以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正在成为民众接收信息、休闲娱乐、精神交往的主要媒介方式,以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主流媒体也纷纷抓住短视频的发展机遇,不断拓展其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吸引力与感染力。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入驻抖音APP,依靠优秀作品吸引无数粉丝、获得海量点赞。再如中宣部开发的“学习强国”凭借聚合性、融合性、服务性特征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创新表达,央视频这一综合性视听新媒体平台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向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总之,上述探索进一步彰显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平台化的鲜明特征与实践要求。

(四)传播方式的视觉化

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视觉化趋向日益明显。“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13]当“看的艺术”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叙事方式时,“仅靠宣讲方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和作用机制的这种转变,我们必须探索更为弥散性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而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正是一种这样的传播方式”^[14]。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单向线性的传统传播理念束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充分发挥视觉媒介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与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

在数智时代,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催生的视觉化数据呈现出井喷之势,“视觉崇拜”“图像狂欢”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新常态和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新表征。图像叙事逐渐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主要选择。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觉化转型与数据可视化分析不谋而合。“数据可视化是将抽象的‘数据’以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帮助人理解数据。”^[15]经过可视化分析的数据具有简明直观、栩栩如生、通俗娱乐的鲜明特征,更加契合现代社会高强度、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格调。2024年初OpenAI重磅发布全球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重新定义了AI文生视频在现阶段的技术极限,进一步丰富了“视频化生存”的文化景观。“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态

由传统的文字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方向转变。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主动借助可视化技术及其广泛应用,通过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图示、表格、音视频格式拓展与创新其表达方式,借助VR、AR、MR等先进技术增强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力争将抽象深奥、理性权威的科学理论转化为感性直观、鲜活生动的视觉表达,实现意识形态呈现方式由“平面化”向“立体化”,“文本化”向“图像化”的时代转型。

三、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蕴

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吸引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永恒课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增强凝聚力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提升引领力是先进理论的本质要求,彰显吸引力是理论掌握群众的主要方式,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实践,共同展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蕴。在数智时代,充分激发先进技术的赋能作用,对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无疑具有独特而鲜活的时代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是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赢得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凝聚作用和统摄效果。从应然状态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市场经济趋利特征、各种社会思潮融汇交织、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冲击、媒体格局深刻变革等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样化的复杂格局。这一格局虽然客观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转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共识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提升凝聚力视为加强和改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乃至中心环节。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16]

数智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的同时也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变革。在数智技术的时空场

域中,反映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样态、生态文明等鲜活实践的海量数据不断涌现,致使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的大量数据充盈着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不论以报刊杂志为主的纸质媒体,还是以电台广播为主的电子媒体,抑或是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网络媒体,都在不断生成和传播承载特定意识形态的多元异质信息,其都可以通过数智技术解析转化为意识形态的相关数据。在数智时代,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对意识形态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储存、分析、整合及应用,有助于实时监测媒介生态和研判社会舆情,准确识别并主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建构“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为整合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技术服务与智力支撑。此外,在数智时代,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根本之道依然在于真正反映并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数智技术归根结底源自人们生产生活的数据集合,只有真正满足大众美好生活所需的思想才能赢得大众的理解与认同。利用数智技术监测社情民意、洞悉现实问题,了解人民所需,有助于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供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有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先进理论魅力,借助各种方式和手段引领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力。马克思主义以其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深沉的人文情怀“依然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内蕴着彰显其引领力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当前,尽管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功能没有变,也不应该变。”^[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国内外环境,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呈现多样多变的复杂态势,如何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阵地正在经历从传统现实场域向数字虚拟场域的时代转场,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变量,我们应积

极促使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数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了新的技术动能和平台载体。在数智时代,应充分发挥我国政府的数据优势,通过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通过推进政务信息的联通共用,争取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在克服“数据孤岛”中不断消除党群干群的疏离感,增加党群干群的互信度,从而为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奠定良好的政务基础。此外,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数据,企业数据也是数智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8],有助于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前提。针对以社交媒体为主要来源的网络数据,也可通过发挥数智技术在海量数据收集汇总、存储管理和分析应用中的技术优势,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不断提升。

(三)有利于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意识形态吸引力是指一个政党或者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理论魅力和价值观念在引领大众、凝聚人心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亲和力、感染力、同化力。“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2]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秉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立足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成为指引人类谋求自身解放的

理论指南,彰显着永恒的真理光芒,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本源。概言之,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需要不断推进先进理论大众化,使来自群众实践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指导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针对20世纪初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潮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渗透和干扰,列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中明确提出了“灌输论”要求。以“灌输论”为指导,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大众化任务。但在数智时代,传统意义上“灌输”模式却难以适应移动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时代潮流,收效甚微。当然,本文认为“灌输”理念并未过时,但“灌输”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充满时代气息的“灌输”方式才能更好地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服务。“数智时代,人们正在普遍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倘若仍旧采用枯燥的说教方式、言传方式宣传理论,不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脱离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路径,还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厌倦与疲惫。”^[19]因此,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技术优势,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教模式的理念更新、方式创新、载体革新,“牢牢地将先进技术把握在意识形态工作者手中,充分运用智能分众化手段为受众提供更为生动、优质的体验感受”^[20],才能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

总之,只有深刻“认识世界”才能有效“改造世界”。深入阐释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鲜明特征与价值意蕴等学理性问题,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该问题的认知程度,从而为辨识数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探求其应对策略提供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2.
-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47,65.
-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6.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8.
- [6]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43.
- [7]韩汶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3-49.

- [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5.
-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1.
- [10]张茂杰,樊瑞科. 理论、现实与实践: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逻辑[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67-71.
- [11]郑永年. 再塑意识形态[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3.
-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2)[2024-03-22]. <https://source.ckcloud.busionline.com/izcoo/>.
- [13]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铨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86.
- [14]刘伟斌.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104-112.
- [15]沈恩亚. 数智技术可视化技术及应用[J]. 科技导报,2020(3):68-83.
- [16]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38.
- [17]王永贵. 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新理念[J]. 江苏社会科学,2013(6):6-10.
- [18]习近平.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 光明日报,2021-10-12(1).
- [19]郑洁. 数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 教学与研究,2017(11):61-68.
- [20]杜宝君,樊瑞科.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87-91.

Three-dimensional Review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AN Ruike, LIU Miaomiao

(School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of data-driven, algorithm-driven,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s flourishing, driv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a new stage.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situation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has become a trend. How to adapt to this tren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new issue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ree basic issues in promo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rom a conceptual perspectiv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unique co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ture analysis,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digitization, process intelligence, carrier platformization, and visual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s, digital technology can help enhance the cohesion, leadership, and attractiveness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bove issues has become a 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ainstream ideology; logical premise; the effect of construction